

昨天的历史 今天的新闻

——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

□ 李红涛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13)05—0018-4

【内容提要】媒体记忆不仅是历史的草稿,还扮演“公共历史学家”的角色。不断书写历史事件的二稿、三稿,更新、强化、修正乃至“扭曲”了公共记忆的面貌。本文聚焦“媒体记忆”概念及相关研究,从新闻聚像的建构与运用、纪念报道与集体认同、媒体记忆实践如何影响新闻业的文化权威等三个方面,检视新闻传媒与集体记忆之间的理论关联。

【关键词】媒体记忆;新闻聚像;纪念报道;集体认同;文化权威

集体记忆的研究传统

何为集体记忆?学者 Zerubavel 强调,正像民意并非个体意见的总和一样,特定记忆社群的集体记忆也并非社群成员个体记忆的总和。集体记忆不仅包括社群成员共享的过去,也涵盖共同记忆或纪念的过去。^①换言之,集体记忆的“集体性”,既体现在记忆形构的社会过程与机制,也体现在最终的结果。作为对过去的再现,集体记忆“展演”并落实了特定群体的身份、当下的处境和对未来的愿景。^②

Zelizer 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集体记忆是过程式的,它的形成是不断展开、变动与转变的过程;第二,集体记忆具有不可预测性,其发展并非线性、合乎逻辑和理性;第三,集体记忆具有时间性,其中隐含着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叙事线索;第四,集体记忆具有空间性,它总是会被锚定在特定空间,或者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说的“记忆场所”。^③这些记忆场所包括墓地、教堂、宫殿、古战场、纪念碑、纪念馆等。这些空间实体,可以将决定性的历史瞬间“冻结”,比如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士兵将国旗插上硫磺岛的新闻图片,就被“冻结”在华盛顿威灵顿国家公墓的雕像中,也“冻结”在邮票等各种介质里,历史事件由此进入实体和虚拟的“纪念空间”;第五,集体记忆是片面的,特定社群对过去的再现总是强调某些方面的同时弱化其他方面;第六,集体记忆可以被利用,不同群体有可能援引集体记忆达成特定的目标和议程;第七,集体记忆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第八,集体记忆带有实体性,不是虚幻地停留于人们脑海里,而是栖身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公共表达当中。

对集体记忆的社会学研究,重心并不在于在事实层面评判真假或在道德层面评判高下,而是关注集体记忆的生成机制和后果,或对“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进行分析。^④具体而言,它们聚焦于两组问题:一是谁在记忆,这牵涉到

记忆社群(小到家庭、工作场所,大到种族和民族国家)与记忆社会化等概念,^⑤二是如何记忆,即集体记忆的渠道和机制,涵盖口语传统(故事、诗歌与传说)、文字(纪实与虚构、历史教科书)、图像与影像(家庭相册、纪录片)以及制度化/专门化的记忆机构(学校、博物馆、大众传媒)等。

记忆社群如何保存并重现记忆?康纳顿分析了最重要的两种集体记忆机制:一是纪念仪式,它借助“重演性仪式语言”指涉原型人物和事件,塑造社群记忆。比如2009年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其中一项仪式便是在勃兰登堡门前推倒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用来“重演”二十年前的这个历史事件;二是身体实践,我们的举手投足、手势体态、餐桌礼仪,都折射出沉淀在身体里的习惯记忆。而通过现在的举止重演过去,这些“体化”实践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⑥舒德森也指出,集体记忆研究过分强调有意识的纪念活动和形式,却忽视了非纪念性的公共记忆形式。^⑦他以水门事件为例,指出人们可以在三个层面捕捉到过去的痕迹——在个体层面,通过与该事件相关的个体生命轨迹;在社会层面,通过法律和其他机构;在文化层面,通过语言(以“某某门”代指政治丑闻)和流行文化。^⑧

Misztal 区分了集体记忆领域存在的四个主要研究传统。^⑨一是哈布瓦赫与记忆的社会情境。哈布瓦赫是集体记忆领域的先驱,在《论集体记忆》乃至更早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中,他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群体(家庭、宗教、社会阶级)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他强调,人类记忆只能在集体语境中运作,而任何集体记忆,都需要身处特定时间、空间中的群体的支持。二是以当下为中心的研究传统。该传统着力于分析支配性的社会团体或权力机构(乃至民族国家)如何通过公共纪念、教育系统、大众传媒、官方历史等手段,重构、改造乃至操纵过去,以使其符合当下的利益和需要(形成社会凝聚力、正当化政治权威、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三是流行记忆或民间记忆视角。与“传统的发明”视角不同,该视角更

【作者简介】李红涛,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为了忘却的纪念: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播”阶段性成果,编号:11YJC860023;本文受到浙江大学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研究院、浙江省之江青年学者计划、浙江大学求是青年学者计划资助。

强调“自下而上”的记忆建构^⑩,其研究重心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替代性集体记忆,或曰“公共记忆”、“反记忆”或“非官方记忆”。四是记忆的动力机制视角。该视角强调,集体记忆并不是任意操纵的产物,对过去的建构是一个协商和争夺的过程,其分析重心在于过去之意义的生产与媒介化。而不同记忆群体围绕过去留下的遗产的协商过程,既牵涉到应该记住“什么”,也牵涉到阐释过去的“正确”方式。^⑪

媒体记忆的类型学

媒体记忆涵盖两个基本的层面,一方面,媒体对重大事件的报道——特别是人们无法亲历但却通过电视“目击”的“媒介事件”——构成重要乃至唯一的信息来源和记忆基础,某些特定的媒介内容(大字报、广播大喇叭、电影电视剧、动画形象)和媒介经验(比如集体观看露天电影)也会成为“世代认同”与“世代记忆”的重要成分。^⑫媒体记忆的这个面向可以被称作“昨天的新闻、今天的历史”,而另一个面向则可以被称为“昨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即历史人物和事件直接以各种面貌进入新闻报道中。其关注的是新闻媒体如何扮演“公共历史学家”之角色,“选择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并阐发它们的历史意义”。^⑬

Lang and Lang 最早探讨了新闻记者在报道中调用历史事件的方式及其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指出过往事件有时候会成为新闻焦点。在聚焦于当下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历史事件被当作“语义标记——用来建立(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将新闻事件归入特定范畴,并作出相应的推断。”^⑭换言之,新闻记者援引历史事件或“公共记忆”来“描绘一个时代,充当(衡量当下事件)标尺,建立类比,提供简略的解释,或者应当汲取的经验或教训”。在此过程中,新闻记者假定过去、现在与未来是线性递进的过程,过去不仅能够帮助媒体“描绘”当前的事件或议题,还能够预测其未来的走向(或者“悲剧不要再演”)。^⑮

延续这一思路,Edy 以 1965 年洛杉矶爆发的瓦茨骚乱为例,试图建立新闻媒体调用历史事件的类型学。她发现有关过去的新闻故事,通常以三种面目出现,分别是纪念报道、历史类比、历史语境。^⑯在日常新闻实践中,除了纪念报道之外,新闻记者通常将语境式的历史叙事当作新闻报道中的背景知识,并籍此暗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因果关联。他们也常常运用类比式的历史叙事来描绘当前事件,比如将“9·11”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或者将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比作挑战者号爆炸的重演。^⑰这些类型不一定独立存在,而是有可能共存于媒体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处理中。Su 研究了“9·21 大地震”十周年之际,台湾媒体对这桩历史事件的两种处理方式。地震十周年前夕,适逢莫拉克台风重创台湾。在对台风灾害的报道中,新闻媒体借助 9·21 大地震并将其视为评判基准和道德寓言,解释当下灾难并预测其未来发展。而在地震十周年前后,新闻媒体则借助幸存者讲述和纪念仪式、事件回顾来建立纪念叙事。^⑱

在每一种情况下,新闻媒体调用历史的形式和实质都有所不同,并对媒介化记忆的形构产生不同的影响。在 Edy 看来,历史语境和历史类比都无助于公众对历史事件之意义的全面理解,因为前者将历史呈现为“事实/证据”而不

是“解释”,后者尽管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联系,但它倾向于将过去“简单化”或“戏剧化”,公众因而无从围绕历史遗产及其意义展开争论。相比之下,系统和深入的纪念报道,则“提供了话语空间,令过去之变动不居的意义在其中展开直接的协商”,^⑲也提供了重新审视过去的机会。

新闻聚像与集体记忆

Edy 讨论的历史语境和历史类比这两种类型,与最早 Bennett and Lawrence 提出的“新闻聚像”概念有着相通之处。所谓新闻聚像,是指“某些(浓缩新闻故事的决定性)画面(瞬间或人物形象),在被媒体引入到后续的新闻故事中后,具有了超出最初事件的生命力”。^⑳换言之,在新闻事件的生命结束之后,新闻聚像的生命力仍得以延续。就此而言,新闻聚像的建构和调用,构成了历史进入新闻报道的一种特殊类型,既可能影响媒体对后续事件的“架构”,也会影响对相关历史事件的媒介“记忆”。

依据两位作者最初的概念,特定新闻事件要转变为新闻聚像,需要经历三个阶段:(1)事件浓缩凝聚为某一个主导性的“画面”/形象,并迅速盖过事件本身,在媒体报道中占据重要地位;(2)画面不断出现在民意调查、脱口秀、跟进的新闻报道和纪录片中,显示出该画面/形象契合了公共想象,代表一般性的议题和关切,或者折射了深层次的冲突、张力或文化价值;(3)画面跳脱最初的事件背景,变成简化的(视觉形象、简短的文字描述)、独立的、象征性的“决定性瞬间”,并被新闻记者当作描述性的线索、历史标志或强化情节的工具,不断引入到后续的、不相干的新闻故事中。除了决定性画面/人物之外,政治人物的言论也有可能变成新闻聚像。^㉑

在引入后续的新闻报道后,新闻聚像被当作“报道策略”,一方面有助于新闻记者向受众讲述后发的事件,即“用熟悉的形象讲述陌生的故事”。^㉒运用历史事件或“新闻聚像”,是日常新闻实践的常规之一。比如 2004 年云南大学的校园杀人案,凶手马加爵变成“校园杀人案”的“代名词”,之后媒体不断以“广州‘马加爵’案”(《新快报》2006 年 11 月 21 日)或“女版马加爵”(《南方都市报》2008 年 1 月 8 日)来报道其他嫌犯为学生的谋杀事件。而在国际报道中,由于受众欠缺与国际新闻相关的背景知识,要呈现国际事件的前因后果变得比较困难,因而对新闻聚像的运用可能更为重要。比如某些经典的新闻聚像(克格勃、古拉格、斯塔西等)成为描述与解释的“捷径”,可将陌生的事件带入本国读者熟悉的政治、文化框架之中。因此,新闻聚像的运用,可以被视为“驯化”国际新闻的一种策略。^㉓学人李金铨、李红涛、李立峰发现,国际报道中运用新闻聚像展开的类比过程,不仅帮助新闻记者确定事件或议题的本质、解读事件背后的原因,还让他们明确道德批判的目标并提出政治和外交层面的解决之道。作为新闻聚像的决定性历史瞬间,由此构成了 Entman 所谓的“实质性的框架”。^㉔

另一方面,新闻聚像的运用,有可能强化新闻记者的自由度,让他们从过往事件的角度提出对当前事态的“界定”,将冒升中的、边缘的议题带入主流视野,或者在缺乏突发事件的前提下,维持公众对特定议题的持久关注或者以过去

的事件为“道德根基”对政府(外交)政策展开批评。在最初对新闻聚像的讨论中, Bennett 及其同事强调, 垃圾船或总统呕吐这样的新闻聚像, 折射了深层次的冲突、社会问题或社会忧虑, 能够提高新闻记者的“能动性”, 让他们在精英话语垄断崩解的时候, 通过讲述令人信服的故事或者为多元的消息来源提供“发声”机会, 积极参与到围绕特定事件和政策的公共辩论过程, 挑战现状, 并将垃圾回收议题或“美国霸权地位衰落”论述正当化。^⑤

Edy and Daradanova 发现, 2003 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之后, 无论是在新闻发布会提问过程还是新闻报道中, 新闻记者都不断地提到 17 年前挑战者号的“教训”。挑战者号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 不仅影响了新闻报道的内容, 也影响了新闻记者收集信息的方式。^⑥在报道中, 新闻记者并不关注哥伦比亚号坠毁的技术原因, 而是不停质疑国家航空航天局是否存在过失。新闻聚像为记者提供了一个“独立”视角, 并藉此平衡由精英支配的新闻框架。Edy 的一篇评述文章也指出, 媒介化的集体记忆有可能打破政府与媒体之间的支配关系, 催生出更为民主的公共讨论。

新闻聚像之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具有非同寻常的“符号”力量, 是因为它们能够唤起或折射深层次的文化主题和张力。但是, Bennett 等人强调, 并不是所有的新闻聚像都会挑战主流价值和意识, 实际上, 很多新闻聚像(比如硫磺岛升旗照片)唤起的恰恰是军事力量、爱国主义和战胜逆境等稳定的文化主题。而这些聚像在新闻话语中的运用, 则会强化现状和主流的社会、政治秩序。^⑦

某些新闻聚像会很快被新闻记者淡忘, 但有些则可能在数十年后还会出现在新闻报道当中。就其对“当下”新闻报道的影响而论, 新闻聚像既可能“照亮”现实, 但也可“遮蔽”现实的某些面向或造成误解。将“过去”当作审视“现在”的棱镜, 有可能忽视事件的差异, 或者弱化特定报道客体(议题或社会组织、国家)发生的变化。^⑧Kitzinger 指出, 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被用作意义相对固定的“媒介模板”之后, 会令新闻记者和受众对当下的事件产生特定的(或许是扭曲的)感知和理解。^⑨Elisabeth Le 发现《纽约时报》与《世界报》对当代俄罗斯的再现, 便是建立在冷战框架之上, 并受到两国对“共产主义苏联”集体记忆的影响, “克格勃”(KGB)等前苏联的“象征物”不时出现在其社论当中。他认为这种新闻实践有可能令对他国的呈现变成“过去的囚徒”, 并阻碍跨文化的理解。^⑩

就其对集体记忆的影响而论, 新闻聚像的建构与运用无疑延长了新闻事件的生命周期, 也通过不断的调用过程, 赋予特定历史事件以“经典”地位或作为“分水岭”的历史意义。但是, 新闻聚像注定是高度浓缩的画面或高度抽象的表述。对原始事件来讲, 新闻聚像与历史类比类似, 都是高度简单化的叙事。一方面, 新闻聚像的运用, 焦点在于“当下”而非“过去”, 它诉诸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既有记忆和相关的情感烙印, 却不能在局促的时事报道中提供关于过去的更为丰富的信息(其“符号力量”也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自然衰减)。另一方面, 新闻聚像所浓缩或凝聚的多为历史事件“共识性”的内核, 因此不能为集体记忆的形构提供“辩论”和“协商”的空间, 或者酝酿对历史的替代性的理解。

纪念报道与集体认同

历史纪念日或重要的时间节点(新的十年、新的政府任期或新世纪的开端), 为新闻媒体提供了“正当的、文化层面合理的新闻由头”。^⑪各种纪念日都被标注在新闻记者的“日历”上, 是否纪念、如何纪念, 媒体都可以提前规划和预先安排。因此, 在纪念新闻中,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对纪念事件的报道, 还可以看到幸存者口述、记者重访(比如汶川地震周年重访灾区报道)、对历史事件的“追忆”, 乃至媒体征集的文学艺术作品(诗歌、绘画等)。

“日历新闻”根据影响的大小也表现纪念报道自身的生命周期。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 媒体将某些纪念日处理得比其他纪念日更为“重要”。李红涛与李金铨对美国媒体关于柏林墙倒塌纪念报道的研究发现, 在 1990 年 - 2009 年周期内, 纪念报道的数量在一周年(1990)、10 周年(1999)和 20 周年(2009)达到顶峰。此外, 与日常新闻报道不同, 纪念报道较少受制于新闻生产的常规和客观性准则。媒体的纪念报道, 常常将报道、观感与评述混合在一起, 构成“混杂式的”纪念文本。^⑫在纪念报道中, 新闻记者不仅报道事实, 更以“相当主观和分析性的方式”来诠释现实, 其中也包含了“以建构过去的意义为清晰目标的叙事”。^⑬

通过“策划”与“展演”, 纪念新闻赋予历史事件以符号的重要性, 更新、强化并构筑出独特的纪念空间。在重要人物过世或灾难过后, 纪念报道变成哀悼与疗伤的媒介仪式。^⑭这种仪式感, 一方面体现在媒体在纪念日有别于平常的版面或节目编排方式, 比如报纸在地震纪念日使用黑白版面, 或者在纪念日不播出广告等。另一方面, 也体现在纪念报道的框架和呈现方式。在此过程中, 媒体报道担负公共仪式的职能, 使得社会、代际与国家等诸层面的集体身份认同得到强化。

当然, 媒体纪念报道并不是孤立的存在,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 其既立足于各种纪念事件, 也是社会性纪念的有机组成部分。White 以 1991 年珍珠港事件 50 周年为例, 说明媒体叙事与官方纪念共同构成了建构记忆的国家仪式。^⑮其通过对纪念叙事话语特征的分析发现, 纪念日的历史叙事带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媒体倾向于强调历史事件的分水岭意义(比如使用“转折点”、“紧要关头”、“关键时刻”、“重大分界线”等词语)并构造出剧烈的时间转型; 二是通过描绘对立的人物形象和动机, 建立高度对抗性的“本国自我”与“外国他者”的分类范畴。这些特征抹去民族国家身份的情境特征和复杂的因果关联, 并唤起国民的愤怒和骄傲情绪。

媒体纪念报道的生产过程既受制于新闻常规, 也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特定记忆社群的文化价值观。仍以珍珠港事件为例, 在二战胜利 50 周年前夕的纪念日, 与隆重的官方纪念活动相呼应, 媒体的纪念报道也相当集中。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 珍珠港的媒体纪念空间也随着外部政治意识形态环境而起落。比如 1951 年珍珠港 10 周年纪念日, 恰逢美国卷入朝鲜战争, 战后的美日同盟关系日趋强化, 因此, 美国媒体没有在纪念日进行大规模报道, 即便少量报道也是强调, “美日同盟应当保持和谐稳定……在今天的珍珠港纪念日, 我们的思绪应该朝向这个未来, 而不是过去”(《华盛顿邮报》1951 年 12 月 7 日社论)。而 2001 年的

60周年纪念日,适逢“9·11”恐怖袭击事件,无论官方话语还是媒体报道,都倾向于将二者并置在一起,对珍珠港的纪念也被当作激发爱国主义情绪的悠远资源。

这一例证一方面说明,新闻媒体的重心始终在当下,纪念报道被嵌入到对“当下”的描绘和理解之中。媒体倾向于“在致力于自己的议程同时,对过去展开集体性的回忆与重构”。^⑧比如美国媒体对柏林墙倒塌的纪念报道,便与东欧在冷战之后的“转型阵痛”紧密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纪念报道将“将现在插入到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视角之中”,^⑨其主题和主导叙事折射出社会主导价值、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延续与变化。Kitch对美国新闻杂志的周年(十年、半世纪、一个世纪)纪念专刊的研究发现,这些纪念报道倾向于强化若干反复出现的核心主题:个人主义、道德秩序、民主和小城镇的幸存等,而这些主题正是 Gans 所称美国新闻业的“恒久价值”,也即美国社会主流的进步主义价值观。概而言之,纪念新闻变成记忆社群的仪式,“再生产当下所需的身份认同”,“更新文化价值,并将社会建构为道德共同体”。^⑩

媒体记忆与文化权威

新闻记者的文化权威,是指他们作为“故事讲述者”和文化生产者——收集、处理、建构并向社会成员传递真实新闻的权威性。^⑪

媒体记忆与文化权威的理论关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媒体作为集体记忆渠道(“过去讲述者”)的正当性。新闻记者毕竟不是历史学家,他们如何确保自己讲述的历史版本和对历史意义的解释是可信的?首先是提供“真实”的历史证据,比如,新闻图片和影像的真实性要超过文字,此外,新闻媒体在纪念报道中,可能重印(重播)他们在历史事件发生时刊发(播放)的报道,既将之作为独特的“历史证据”或“历史草稿”,又强调新闻媒体与历史事件之间的紧密关联。^⑫其次是消息来源的运用。Zandberg研究了7份以色列报纸在过去五十年间有关大屠杀纪念日的专刊。发现纪念文本的作者和纪念报道经常援引的权威消息来源包括:亲历者(大屠杀幸存者、幸存者亲属,其权威建立在“目击”基础上)、官方人士(其权威源自所在机构)、学者(其权威源自专业可信度)、其他文化人士(作家、诗人、视觉艺术家)、专业人士和记者。^⑬其中,亲历者是最权威的讲述者,其他人群各自有其权威性基础。新闻媒体借重这些消息来源(特别是将亲历者叙事与其他来源相结合),强调其纪念报道的可信度。此外,记者——历史事件的报道者——有时候也会强调自己的“目击者”身份,由此建立其“个人化”历史叙事的权威性,或者被专栏作家用来捍卫自己的评论立场。

二是媒体记忆实践对其总体正当性和专业权威的影响。在对历史事件及媒体作为的不断重述中,电视记者运用三种叙事方式来建立他们的权威:一是提喻,即尽管记者并没有“目击”刺杀事件,但他们参与报道肯尼迪的葬礼等相关活动,使得他们成为扩展意义上的“亲历者”。二是遗漏,即在重述中强化电视记者的作用,弱化广播、地方媒体和业余人士的作用。三是私人化,即根据“亲身经验”来讲述历史事件和媒体报道。通过将自己放到故事的中心位置,新闻记者将刺杀事件从关乎肯尼迪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关乎美国

新闻记者的“传奇”故事。^⑭

除了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出场”和“作为”,媒体也致力于建构新闻业的集体记忆,或通过对新闻业历史的策略性运用,来强化自身的专业权威与正当性。某些纪念契机——比如著名新闻人逝世或媒体的纪念日——为新闻媒体提供了反观自身或为自己“加冕”的机会。2002年Kitch以25种全国发行的消费杂志为个案,探讨了美国新闻媒体如何庆祝自己的纪念日,籍此将自己定位为公共历史学家——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讲述者。^⑮她发现,这些纪念专刊运用了一系列修辞策略来强化新闻权威和自身的重要性。一是重印过刊的内容作为历史“证据”;二是通过视觉设计、厚度和主题将杂志周年专刊提升为“纪念对象”(当作纪念品珍藏);三是将过去“私人化”(比如杂志如何改变读者的生活、重访新闻当事人等);四是从过去展望未来。

当下的新闻人将前辈的职业成就视为新闻界秉持的价值与规范,并将其职业生涯与当下的媒体环境(技术变迁、媒体可信度降低、权威性面临挑战)两相对照,强调坚守这些核心价值的重要性。而在CBS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逝世之后,新闻媒体将克朗凯特的电视网时代与当今碎片化、异质性的新闻环境相比较,既表达出对黄金时代的怀旧情绪,也批判式地检讨了当下电视新闻的处境。新闻社群讲述的关于自己的过去的故事,既折射并塑造了新闻界的自我意识、自我期许,也反映出他们试图强化其社会角色、争取公众认可的种种努力。■

参考文献:

- ①⑤⑪ Zerubavel, E. (1996). Social memories: Steps to a sociology of the past,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 (3): 283-299.
- ⑨ Misztal, Barbara A. (2003). *Theories of Social Remembering*.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⑫ Zelizer, B. (1990). Achiev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rough narrativ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 (4): 366-376.
- ⑬ Olick, J.K. and J. Robbins (1998).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05-36.
- ⑭ Connerton, Paul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⑮ Schudson, M. (1997). Lives, laws, and language: Commemorative versus non-commemorative forms of effective public memory.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2 (1): 3-17.
- ⑯ Schudson, M. (1992). *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⑰ Johnson, R., McLennan, G., Schwarz, B. and Sutton, D. (eds) (1982). *Making Histories: Studies in History Writing and Politics*. London: Hutchinson.
- ⑱⑲ Maass, M. and González, Jorge A. (2005). Technology, global flows and local memories: Media generations in ‘global’ Mexico,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 (2): 167-184.
- ⑳㉓ Kitch, C. (1999) Twentieth-century tales: Newsmagazines and American memory.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 (2): 119-155.
- ㉔ Lang, Kurt, and Gladys E. Lang (1989).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news. *Communication*, 11: 123-39.
- ㉕ Tenenboim-Weinblatt, Keren (2011). Journalism as an Agent of Prospective Memory, in *On Media Memory*, pp. 213-225.
- ㉖⑳ Edy, Jill A. (1999). Journalistic uses of collective memory. *Journal*

(下转第25页)

(二)网络文本构建公共话语场

费斯克研究大众文化,是要指出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但他探究的并不是直接的社会行动,而是非常隐形却很真实的政治化意识。这种政治化意识既存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存在于个人幻想的内在世界。

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存在着一种符号形式的持续抵抗过程,主要表现为一种比较缓和的意义争夺战,目的在于维持或提高自下而上的大众权利意识。费斯克把这种抵抗称为大众模式,即微观政治的对抗。微观政治是个人幻想的内在世界,它可以在某个时刻——狂欢时超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范围。虽然主导性话语是直接体现意识形态的,主宰着人们说话的逻辑,但如果给这种内在反抗赋予社会意义,即通过一种正式或非正式关系,把自己的内在反抗与别人的内在反抗结合起来,那么其进步的政治潜能就会迅速增长。

网络媒体为这种微观政治提供了平台,大众依托这个平台构筑起公共话语场。在这个话语场内,网民不再只是关心统治阶级生产的哪些文化资源与自己生活相关,文化资源与日常生活的共鸣已经难以带来满足的快感,他们更乐意从网络文本中找到自己与大众的共鸣,把个人幻想的内在世界借由网络媒体诉诸大众,并从大众那里获得积极的响应。在这个话语场内,网民热切关注统治阶级的公共事务,一方面对社会政治事件品评议论,从中获得意义再生产与流通的快感,例如薄熙来、王立军的落马;另一方面也积极生产着社会政治事务,例如“表叔”“房姐”“红豆局长”等。

2013年4月,河北省沧县环保局长邓连军在回答记者“地下水变红”的质疑时,认为红色水不一定说明是污染,并反唇相讥说“红豆也能染红水”,网民戏称其为“红豆局长”。这个局长“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的说辞,一时间成为网络舆论焦点。生态环境污染始终牵动社会神经,一直是大众热切关注的话题,容易产生集体围观效应。邓连军被免去环保局长职务后,网友戏称,治污提上日程,还要感谢“红豆局长”说瞎话。

网民狂欢式参与意义生产,一方面凸显公民社会的崛起,即通过网络媒体见证某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影响公共议题,形成舆论压力,对现实社会起到监督作用;另一方面也不断提高公民的议政热情和讨论水平。当然,狂欢式意义生产导致的情绪宣泄过度和言论失控等问题,也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 [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年。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加]罗伯特·洛根著,何道宽译:《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钱中文编:《巴赫金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李岩:《意识形态下的大众传播话语秩序——主导性话语与职业性话语共存现象分析》,《新闻与传播评论》2003年第1期。

(上接第21页)

of Communication, 49 (2): 71-85.

①⑦ Edy, Jill A. and Miglena Daradanova (2006) 'Reporting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Past: From Challenger to Columbia',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7(2): 131-51.

①⑧ Su, C. (2012). One earthquake, two tales: Narrative analysis of the tenth anniversary coverage of the 921 earthquake in Taiwa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4 (3): 280-295.

①⑨ Bennett, W. Lance, and Regina G. Lawrence. 1995. News icons and the mainstreaming of social chan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5(3): 20-39.

①⑩ Lee, Francis L. F. (2012). The life cycle of iconic sound bites: Politicians' transgressive utterances in media discours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4 (3): 343-358.

①⑪ Berkowitz, Dan (2011). Telling the unknown through the familiar: Collective memory as journalistic device in a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in *On Media Memory*, pp. 201-212.

①⑫ Clausen, Lisbeth (2004). Localizing the global: "Domestication" processes in international news produc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6 (1): 25-44.

Pan, Zhongdang, Chin-Chuan Lee, Joseph Man Chan and Clement Y. K. So (1999). One event, three stories: Media narratives of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in Cultural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1 (2): 99-112.

①⑬ Entman, Robert M. 2003. Cascading activation: Contesting the White House's frame after 9/11.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 (4): 415-32.

①⑭ Denham, Bryan E. (2008). Folk devils, news ic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panics: Heroin Chic and the amplification of drug threat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Journalism Studies*, 9 (6): 945-61.

①⑮ Kitzinger J. (2000). Media templates: Patterns of association and the

(r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over tim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 (1): 61-84.

①⑯ Le, Elisabeth (2006).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editorials: Obstacles to a renegotiation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ism Studies*, 7 (5): 708-728.

①⑰ Schudson, M. (1986). When? Deadlines, datelines and history. In R. Manoff and M. Schudson (Eds.), *Reading the News* (pp. 79-108). New York: Pantheon.

①⑱ Li, Hongtao and Lee, Chin-Chuan (2013). Remembering Tiananmen and Berlin Wall: The Elite U.S. Press's Anniversary Journalism, 1990-2009,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ICA, June 17-21, London.

①⑲ Kitch, C. (2003). Mourning in America: Ritual, redemption, and recovery in news narrative after September 11. *Journalism Studies*, 4 (2): 213-24.

①⑳ White, G. M. (1997). Mythic history and national memory: The Pearl Harbor anniversary. *Culture Psychology*, 3 (1): 63-88.

㉑ Zelizer, B. (2008). Why memory's work on journalism does not reflect journalism's work on memory. *Memory Studies*, 1 (1): 79-87.

㉒ van Ginneken, J. (1998). *Understanding global new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㉓ Neal, A. G. (2005). *Nation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Memory: Extraordinary Events i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ME Sharpe.

㉔ Eason, David L. (1986). On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e Janet Cooke scanda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3 (4): 429-447.

㉕ Zandberg, Eyal (2010). The right to tell the (right) story: Journalism, authority and memor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2(1): 5-24.

㉖ Kitch, C. (2002). Anniversary journalism,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cultural authority to tell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past.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36) 1: 44-67.